谈基础道德与基础修养

陈祖楠摇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摇录

第一讲摇修德为本 …… (员

第二讲摇胸怀祖国 …… (圆园
第三讲摇心有他人 …… (源园
第四讲摇自尊自爱 …… (远园
第五讲摇礼貌待人 …… (愿员
第六讲摇注重仪表 …… (怨缘
第七讲摇举止文明 …… (员园园
第八讲摇文明用餐 …… (员圆源
第九讲摇讲究卫生 …… (员猿园
第十讲摇起居有则 …… (员缘缘
第十一讲摇勤奋惜时 …… (员苑园
第十二讲摇助人为乐 …… (员怨园
第十三讲摇诚实守信 …… (圆园园
第十四讲摇严己宽人 …… (圆园源
第十五讲摇孝敬父母 …… (圆园愿
第十六讲摇遵守公德 …… (圆员远
第十七讲摇保护环境 …… (圆圆园

第十八讲摇修身养性 …… (圆猿怨
后记 …… (猿员远

第一讲

修德为本

员愿愿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德育文件——我们的德育工作需要改革——德育的概念——要实事求是地确定德育目标,科学地确定德育内容——我国古代小学教育重视基础道德教育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建国以来学校德育忽视了基础道德教育——什么是基础道德?——德育工作的另一个失误:忽视养成教育——忽视养成教育的后果:很多人缺乏基础修养,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

我们德育工作的效果总是不大理想。我们的学校德育存在什么问题,症结又在哪里?我们的德育是否也需要改革?

员愿愿缘年以来,我任教的绍兴文理学院的德育工作作了一些改革,在思想品德课里增加了“基础修养”的内容。学校希望加强基础道德教育,重视大学生的基础修养。

这项改革是根据中共中央 员愿愿缘年 员缘号文件《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进行的。绍兴文理学院前身绍兴师专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中学教师,当时在德育工作方面所作的改革,也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是建国以来德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我们的德育工作本来就存在着一些脱离实际的“左”的东西,到“文化大革命”时恶性发展,德育工作遭到严重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思考,□□□□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这是一个通篇充满改革精神的德育工作文件。但这个文件“生不逢时”,发布不久,便遭遇□□□□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因而没有来得及认真贯彻,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十分重要但没有来得及认真贯彻的德育文件”①。

我们的德育工作是否需要改革?直到现在我们对德育改革还是慎之又慎,多说“改进”,慎谈“改革”。□□□□年□□号文件将“改革”二字直书中央德育文件的标题,真是振聋发聩。

德育工作是否需要改革?我们首先对建国以来的德育作一个反思。我们对德育工作不重视吗?不。从中央到地方给学校发文件时,总是指示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德育工作。我们有一系列的口号,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是统帅”、“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等等。这些话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我们有严密庞大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机构,如在高校,学校有党委全面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党委的组织部、宣传部、学工部都管思想政治工作;各系有党总支,下面有党支部;校长对德、智、体全面负责,毛泽东说思想政治工作校长更应该管;校长下面有学生工作委员会、有学生处;群众团体有工会、团委,思想政治工作“党政工团齐抓共管”。我们还有众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不说兼职的,专职的政工人员有

① 拙作《一个十分重要但没有来得及认真贯彻的德育文件》发表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年第□期。

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团委书记、团支部书记、政治教师、德育教师、辅导员，这支队伍叫政工队伍，有固定的编制，人员都有保证。我们在德育上花了不少时间，政治课、德育课、班团活动、形势报告、英模报告、节日教育、时事学习、班主任谈话等等，少说每周花在德育工作上也会有一天时间。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但德育效果如何呢？并不理想。不少青年人缺少基本的道德观念，很多人没有公德意识；大学校园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也并非人人或者说大部分人都能遵守公德，而社会公德这是最基本的公共生活准则。我们的留学生到了国外，因为没有责任心，不讲诚信，人家说“大陆出来的留学生连做人的基本道理也不懂”。这话听起来很刺耳，要是在过去，一定会以为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对我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恶意攻击。可是，说这话的那位波士顿大学教授恰是一位友好人士，还是美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一心想帮助中国留学生，只是这些学生不守基本道德规范，实在令他生气。那么，我们的学生政治上是否成熟？“大德”如何？也令人担忧。不少人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稍有风云变幻，就晕头转向。我们在德育工作上花了大力气而效果不佳，还不需要反思，还不需要改革吗？

多年来，我们的德育工作存在“左”的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时，极左思潮泛滥，在极左路线统治下，教育受害，德育遭殃，其后遗症在短期内难以消除。我们把德育目标提得很高，高得无法做到，德育内容又多、又杂、又空。讲了很多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却不讲身边应遵守的社会公德；讲了很多社会主义原理，阶级斗争的道理，却不讲现实的做人的基本道理。目标高得脱离实际，内容空泛庞杂，德育犹如在“高空”作业。

我们高度重视德育工作，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大的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力,而效果很不理想,德育工作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我们的德育工作怎么不需要改革呢?我们国家的改革是长期的、综合性的。经济体制要改革,教育体制要改革,连政治体制也要改革。在教育领域,我们要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后勤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改革等等,德育难道不需要改革吗?[illegible]年后,我们的德育避谈"改革",只讲"改进"。德育工作的效果与在德育工作上所投入的精力有这么大的反差,如果只在原来基础上作些"改进",那么德育工作的失误就难以纠正,德育工作也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illegible]号文件提出德育工作需要改革,并把"改革"二字赫然写在文件的标题上,是对[illegible]年德育工作回顾、反思得出的正确结论。现在看来是多么难能可贵!

我们的德育工作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是我们对德育概念的理解是有片面性的。[illegible]年中央[illegible]号文件在阐述德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时用一个插入语对德育作了解释:"德育即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一个不起眼的插入语,似乎是顺便提及,却是对德育概念的界定。它有很强的针对性。德育自从有教育以来它就存在,单说建国以来到[illegible]年就讲了[illegible]年,可是长期以来对德育概念的表述十分混乱。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把德育称为政治思想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尽管政治思想教育与德育有共同点,但两者毕竟有区别,不能等同。政治思想教育,顾名思义是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德育应包含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但更应该讲道德品质教育。如果以政治思想教育替代德育,必然忽视道德品质教育,在教育实践中我们也正是以政治概念的灌输,以极左的空头政治的说教来代替德育,这是我们德育工作的一大失误。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为了巩固政权,学校教育强调甚至突出一下政治教育是需要的。但在巩固政权以

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我们的学校德育仍然以政治教育取代品德教育,这不能不说是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极左政治路线的影响。德育是什么?胡厚福认为,“德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品德”,“品德包含思想品质,政治品质,法纪品质和道德品质等四种基本品质”①。胡筠若认为,“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方面的内容”②。胡筠若的观点可以代表一般德育理论工作者对德育的基本共识。由此可见,[illegible]号文件对德育概念作如是表述,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能起统一认识的作用。“德育即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这一表述,一是阐明了德育的内涵,德育包含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二是从排列次序上也提醒教育工作者,德育首先应该是思想品德教育,从人的品德发展顺序来说,也应该先是道德品质,然后才是政治品质,道德品质处于基础层次,政治品质处在高层次上,政治品质要以基本道德品质为基础。

以“左”的观点片面理解德育概念,以政治思想教育替代德育,其结果是削弱了道德教育。我们有少数留学生在国外的表现,被人家批评为连做人的基本道理也不懂,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也值得我们反思。细细想来,我们在学校里给学生讲了多少做人的基本道理?[illegible]世纪[illegible]年代初期,中学政治课作过改革,把中学教材中的《政治》改为《青少年思想修养》。《青少年思想修养》前言中说这门课要让学生“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一

---

① 胡厚福:《德育学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② 胡筠若:《中学德育大纲的研制及有关理论问题》,见《中学德育大纲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提法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但再版时这句话被删去了。我不知道其中原因,可能是觉得“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一提法缺乏阶级分析吧。这一猜想以后得到了证实。那已是 [illegible]世纪 [illegible]年代,我在绍兴师专主持工作期间给我们的学生——未来的中学教师进行养成教育补课。一次省高教工委举办“两课”教育研讨会,邀我在会上作个发言。我在发言中讲到“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补课也是让学生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这次研讨会颇受当时国家教委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有几位司领导参加。吃中饭时,会议主持人要我过去与他们同桌用餐,我客气了一下没有过去。后来说是有位领导要与我商榷商榷,这样我不得不过去了。这位领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亮出了他的观点。他说,“你说要学会怎样做人,我想应该讲做社会主义的人”。“商榷商榷”,原来如此!我想如果没有“左”的偏见,一个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的人,总要先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然后才接受政治信仰,确立社会主义理想,做社会主义的人。想不到,时至 [illegible]年代,要学生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学会怎样做人,还会遭致非议!

做人的基本道理,就是人的基础道德,也就是“公民基本道德”。现在我们终于讲“公民基本道德”了,而过去我们确实对道德建设有所忽视,学校德育也不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

教育“以人为本”,育人应该“以德为本”。

我们以往德育的另一个问题是德育目标定得太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共产主义接班人”,高得凌空,很难操作。道德教育要求也太高,“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培养共产主义道德”,不分层次,统一要求,难以做到。[illegible]年中央 [illegible]号文件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确定中小学德育工作的任务和内容”。文件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确定”,既是对今后确定德育目标、确定德育工作任务和内容时的要求,也是对长期以来德育目

标、德育内容的确定不实事求是倾向的批评和否定。员愿年中央员源号文件规定："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中央文件实事求是确定的德育目标，使德育从"天上"回到了"地上"。文件规定的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主要是道德品质培养教育的任务，热爱祖国，遵守公德，行为文明，遵纪守法，都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为实现这一德育目标，落实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培养，中央文件指出："德育对中小学生，特别是小学生，更多的是养成教育。要制定并组织试行中学生和小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使学生牢记规范要求，逐渐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次提出"养成教育"，而且以"更多的"来强调养成教育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绍兴文理学院的前身是绍兴师专，当时的培养目标是中学教师。考虑到中学德育更多的是养成教育，而我们的学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养成教育，自己有很多行为还很不规范，因此必须对师范院校的学生——未来的教师，进行养成教育的补课。多年来，师范院校的学生必须进行养成教育补课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并为学生所欢迎。以后绍兴师专改建为绍兴文理学院，我们不仅对师范生，对其他专业学生也进行养成教育的补课。现在养成教育补课已改为"大学生基础修养"。根据中央德育改革的精神，多年来我们对师范生进行养成教育补课，对大学生进行基础修养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的学校德育、公民道德建设，目的在提高学生、公民的道德素质，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

义公民。我们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必须根据教育的客观规律,科学地、有序地进行。[illegible]年中央[illegible]号文件是德育工作的一次重大改革,文件确定的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突出了基础道德的教育,强调道德品质的培养要落实到行为规范的教育中去,行为习惯的养成要渗透基础道德的教育。它体现了德育工作要抓基础、重实效的精神。

道德品质的培养要从基础抓起。我国古代教育就很重视青少年基础道德教育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我国古代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元代学者许衡在《小学大议》中说,“古者民生八岁,上至王公,下至庶人小弟,皆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自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士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就是养成教育。南宋理学家认为“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朱熹研究蒙学,著作很多,成就极大。为规范儿童日常行为(分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写文字以及杂细事宜五项),他专门编写了《童蒙须知》。他认为儿童“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冠中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说话“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洁净。文字笔砚,百凡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之所”。他对起居饮食举止都有具体要求,“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喧哄斗争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要为”。“凡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凡开门揭帘,须徐徐轻手,不可令震惊声响”。“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

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都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不能久也”。“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书，严正分明，不可潦草”。这些都是学生需要养成的良好的行为习惯。

明代屠羲英主张幼童时就要进行礼的教育，他综括前代训蒙要语，撰写了《童子礼》，全篇共分三类。一为检束身心之礼，有盥栉、整服、叉手、肃揖、拜起、跑、立、坐、行、言语、视听、饮食十二目；二为入事父兄、出事师长之礼，有洒扫、应对、进退、温情、空省、出入、馈馔、侍坐、随行、邂逅、执役等十一目；三为书堂肄业之礼，有受业、朔望、晨昏、居处、接见、读书、写字等七目。此外古代的蒙学读本如《弟子规》、《小学日程》、《家塾常仪》等，对日常行为规范都有具体规定。

我国古代传统蒙学很强调对儿童要从小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认为儿童就学，开始就要树立远大志向。所谓远大志向就是要做贤者圣人。而要成为贤者圣人，必须从小有严格的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训练。明代学者屠羲英编撰《童子礼》在前言中说：“《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而养正莫先于礼，盖人之失其正，以自外于圣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闻礼教，则耳目手足，无所持循；行止语默，无所检束。及其既长，沿习偷安，徇情任气，如已决之水，不可堤防；已放之条，不可盘郁，何所不至哉！”从屠羲英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基础道德教育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把它称之为“圣功”。强调基础道德教育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要从小进行。儿童有很大的可塑性，在蒙童阶段忽视基础道德的教育，不重视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将来就难以塑造，难以成才。

古代学者认为小学是基础，小学是“作圣之基”，这一阶段十分重要。朱熹说，“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察乎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功”。就是说小学是大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将来难以发展，难以成才。古代特别重视小学，就在于小学乃是“作圣之基”，“学圣人之道，必自小学始，否则虽欲勉焉而进于大学，犹作室而无基也，成亦难矣”。朱熹认为只有以良好的小学教育作为基础，“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空坚守，涵养纯熟”，长大之后，才能通达事物，无所不能。

我国古代学者还很强调人才培养、品德教育的循序渐进。宋代学者吕大临说，“古之教者，学不躐等，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小学阶段的教育，古代学者认为不能超越。朱熹坚持认为如果自幼失去小学之序，只有补上了这一课之后，才有继续大学教育的可能 完成了大学阶段教育的人，甚至功成名就了，再读读《小学》还是会有教益。徐梓先生在《中国传统蒙学述评》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进士向一位年过 愿园的学者请教治学的方法，这位学者告诉他要从读《小学》开始。进士开始不服气，认为自己小时读过此书，现在已功成名就，不应该再读这部小孩子们才读的书了。后来，进士回家取读此书，觉得其味无穷，手不释卷。三个月后进士谒见学者时，学者见面就说：“得毋读《小学》来耶？”进士颇觉奇怪，反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这位学者说：“看汝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与前迥殊，吾固知读《小学》有得也。”进士于是“大钦服而返”。① 古代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养成教育。良好的行为习惯包括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基本礼仪、做人道理，是学生成才的基础，对他们今后发展有很大影响。“学不躐等”是古代教育的宝贵经验，已“躐等”的，就要补课。

---

① 参见徐梓、王雪梅编：《蒙学须知》，山西教育出版社 员愿员年版，第 远-苑页。

总之，我国传统教育重视蒙学，在小学阶段十分重视基础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还很强调小学对人的成才的基础作用，如果教育失序，还必须补上这一课。这些观点都可作为我们进行养成教育，甚至在大学阶段进行养成教育补课的借鉴。

但建国以来学校德育忽视对青少年的基础道德教育，取消了“公民”课，改为政治课，学校德育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至于道德教育，一是要求太高，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一心为公”等，多是道德的最高层次——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二是道德教育讲的大多是政治道德，政治道德教育又以政治概念的灌输为主，效果也并不好。由于学校德育长期来不重视对学生进行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以致有的人大学毕业了连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这是我们教育的一大失误。

道德是有层次的。罗国杰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体，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即人类公共生活准则、全体国民公德、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从一定意义上看，全体国民公德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大体可以同属于一个层次。”①

北京大学的魏英敏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道德体系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不同层次”，这“三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②

虽然几位学者对道德层次划分不同，但道德有层次这一认

---

① 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llegible] 年版，第 [illegible] 页。

② 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illegible] 年版，第 [illegible] 页。

识是共同的 还有,共产主义道德大家都认为是道德的最高层次。

道德是有层次的,最低的层次是否是基础?在不同层次的道德中,是否有基础道德?我认为是有的,在不同的道德层次中我们可以划定一个基础道德的层次。所谓基础道德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些道德规范是基本的,是人人应该做到的,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当然应该做到,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也不应该违反。二是这些道德规范是基础的。所谓基础就是说没有这个基础道德,不可能建立道德的更高层次,更不能建立起道德的最高层次——共产主义道德 没有这个基础道德,谈共产主义道德犹如在建空中楼阁。

什么是基础道德?我认为基础道德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说是基础道德,因为这是高层次道德的基础,人有了基础道德,就可以说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在这基础上接受更高层次的道德教育和提高道德修养就比较容易,如果说没有良好的道德素质,没有基础道德,高层次的道德建设就成空中楼阁。一种社会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建国初期一大批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其中不乏在国外有相当社会地位、学术地位的知名学者,他们有丰厚的收入、优越的生活条件。新中国成立了,他们先后回到祖国,热情地投身祖国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亲聆共产党的教育、人民政府的号召,可是他们回来了,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改革开放后我们陆续选派学生去发达国家留学,去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差不多用[illegible]个农民的一年收入,作为他们一个人的生活学习费用,希望他们学成回国参加现代化建设。可是很多人出去不回来了。当然没有回来的情况是复杂的,有的是所学专业国内还不需要,有的是国外科

研条件好,回到国内没条件进行研究,但很多人都是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人才,然而从报上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回来的人还不到三分之一。这些留学生可以说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们从小接受少年先锋队的教育,在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向少先队队旗宣誓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长大一点他们又接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教育,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小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他们接受过阶级斗争教育、路线斗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接受过反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教育、反对修正主义教育,可是出去后有人连头也不回,一去不返。为什么受的是旧教育,从未受过共产党的教育的人,新中国成立了,就热情地回到祖国参加建设?我认为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基础道德起了作用。中国旧教育重视儒家伦理道德,儒家伦理道德中有很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中许多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是基础道德。受过“义”的教育的知识分子解放前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深感蒋介石之“不义”;事实教育他们共产党是“仁义之师”,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一个“忠”字使这些知识分子在看到国家有希望时,就考虑寻找机会报效祖国。懂得做人基本道理、有正义感的人,就比较容易接受马列主义真理,具有基础道德的人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相反,没有受过基础道德的教育、不懂做人基本道理的人,即使给他们灌输了许多意识——阶级意识、路线斗争意识、社会主义觉悟,灌输了很多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旦离开了原来的社会环境,没有了政治限制,去掉了组织约束,原来的意识就会淡化,早先的“主义”便会倒塌,因为它没有坚实的基础。少数肩负着国家和民族希望的留学生,在学成之后不是回来报效祖国,而是为营造自己的小家,千方百

计设法领取绿卡,争取定居国外。与其说是这些人国家观念淡薄,不如说是不懂“知恩必报”;与其说是这些人社会主义觉悟太低,不如说是他们不知“言必信”的古训。出去时信誓旦旦,甚至签有合同协议,可是出去了,说话就不算数。他们不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其说这些人脑子里没有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如说这些人太不讲“义”,不懂“见利”应该“思义”;与其说是我们思想工作淡薄,需要加强三热爱、四原则的教育,不如说是我们忽视了基础道德教育,这些青年人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长时期来我们只给青少年讲政治,讲主义,讲“大德”,学校德育不讲做人基本道理,不讲人人必须遵守的社会公德,不讲日常行为规范,这是“左”的路线造成的学校德育工作的重大失误,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失误。

我们的学校德育乃至社会道德建设还有一个失误,就是不重视行为规范的教育,即养成教育。建国后我们第一次提出中小学生要进行养成教育已是[illegible]年的事了。当时何谓“养成教育”,教师也不知道,连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上也没有这个词条,可见我国不重视养成教育情况之严重。不重视养成教育是极左思潮在教育工作上的反映。

在“左”的思潮泛滥时期,我们很荒唐地把文明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要说衣服穿得漂亮点,连衣着端正也会被指责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你向朋友借用一下钢笔,说“请你把钢笔借我用一下”,对方会说你这样客气干什么?这“客气”是指那个“请”字。你用完钢笔还给人家,说一句“我用完了,谢谢!”这下对方可能会说“你太客套了!”这“客套”就是因为你说了句“谢谢”。文明礼貌的语言于我们竟是这样不习惯!进入人家工作室随便翻动人家的东西,你劝说一句“不要翻检人家东西”,对方会说“你哪有这么多穷规矩!”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礼貌

语言、文明举止都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去说它了,那是登峰造极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前,认为无产阶级不必讲文明这种偏见已经存在。那时学校劳动很多,教师三四两节有课,一二两节还在地里劳动。上课了,有位老师匆匆忙忙一个裤脚高一个裤脚低地拿着书本进教室了。我有点不以为然,提醒一句“伊老师,你还有一个裤脚没放下来呢”。这位教师却很不以为然,看看自己的裤脚,还跷起来让你看看,“我们工农大众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嘛!”在那个时代,赤脚上讲堂是知识分子工农化,说话粗声大气是革命者的气魄,衣衫邋遢方是无产阶级本色。这是对无产阶级对革命者的曲解。如果说要讲文明,无产阶级也要讲文明,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主义者更要讲文明。认为讲文明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把文明当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今天听起来是多么荒唐,可过去还真是这样。这也影响了我们对青少年的行为规范教育。这是建国后不重视养成教育的又一个原因。

在中小学不重视行为规范的训练,没有规范的养成教育,升入高等学校后很多大学生的行为习惯也很差。

清晨打过了起床钟,宿舍区依然静悄悄,很多大学生没有早起的习惯,喜欢睡懒觉,——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清洁工人刚扫干净的路面,马上有人丢下果壳纸屑;草坪围坐,聊天谈心,转过头去就会吐痰,——没有维护公共卫生的意识。见人不打招呼,碰到老师不习惯问好;上老师家求教,进屋不敲门,谈话不使用礼貌语言——与人交往不讲礼貌。台上作报告,台下开小会;观看演出,与朋友谈天说地,大声评论,从开始演出,直到演员谢幕从不鼓一次掌——不懂得应该尊重他人。

过去总认为讲道德,一定是我社会主义中国最高尚,这在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